

文章编号:1674-8107(2019)02-0116-06

贾谊为何不被汉文帝所用

彭丽华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 贾谊是西汉初杰出的政论家,他提出了一系列切中时弊且影响深远的政治主张,但他却不被汉文帝所重用,究其原因,乃是因为贾谊的主张损害了朝廷重臣等人的既得利益,而汉文帝以藩王身份继承皇位,皇权有限,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将他贬为长沙王太傅。之后贾谊被迁升为梁怀王太傅,因其削藩措施不符合汉文帝以诸侯王国拱卫西汉中央王朝的思路,故也不被汉文帝采用。

关键词: 贾谊;汉文帝;有限皇权;削藩

中图分类号: K234.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9.02.018

贾谊是汉代杰出的政论家。公元前 178 年,贾谊被廷尉吴公推荐给汉文帝,被任命为博士,秩六百石,深受汉文帝赏识,一年之后,便升迁为太中大夫,秩比千石。然而,贾谊很快被贬到长沙,直到汉文帝七年(公元前 173 年),才被召回,被任命为汉文帝爱子梁怀王太傅,他后来多次上疏陈情献策削藩,却依旧不被采用。汉文帝十一年,梁怀王坠马而死,一年后,贾谊郁郁而终。

贾谊被贬的原因自古以来便引起学者的讨论,古有西汉刘向、唐代李白、北宋苏东坡,近有金春峰、任继愈等老先生,最近几年来又有王兴国《贾谊评传》^[1]、唐雄山《贾谊礼制思想研究》^[2]、赵敏、吕巧英《略论贾谊的有为治国之策》^[3]、周晓露《贾谊被贬原因新探》^[4]、陈建《贾谊人生悲剧成因之探究》^[5]等从贾谊的性格、思想、汉初社会现实等方面探究贾谊政治悲剧的原因,综合其观点大略如下:1.才华太高遭致嫉恨,被权贵所排挤。2.思想不够成熟,对社会现状把握不够。3.思想主张与现实相悖。其中又以第一种最为常见,因论著颇多,故不一一列举。近来重读李开元先生所著《汉

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一书,作者十分强调军功受益阶层在汉帝国的建立及其在汉代前期政治舞台上的作用^[6],笔者颇受启发,对贾谊为何不被汉文帝所用,有一些新的思考,谨作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西汉帝国是经历了秦朝十五年的暴政统治、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之争才建立起来的。《汉书·食货志》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7](P1127)}这明确告诉我们西汉建国初年物资严重匮乏、饿殍遍地、国力衰微,连天子车驾也无法配备四匹毛色一致的马,将相有时甚至不得不乘坐牛车的社会状况,这要求统治者实行与民休息的无为政治。此外,西汉初年的掌权阶级都是跟随刘邦东征西讨的功臣,除张良、张敖、叔孙通等少数几个人外,其余诸如樊哙、陈平、王陵、审食其、陆贾、灌婴、周

收稿日期:2018-11-0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宋时期的桥梁、法制与社会研究”(项目编号:16CZS041)。

作者简介:彭丽华(1983-),女,江西吉水人,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研究。

勃、夏侯婴、娄敬等人都出身于社会下层,因为帮助刘邦取得天下而列位公卿,清代学者赵翼称之为“布衣将相之局”^{[8](P36)}。刘邦集团以军功大小而分配权益,秉持的是一种共天下的理念,这决定了刘邦的皇权与秦始皇的专制皇权相比只是一种相对性有限皇权^{[7](P143)}。作为开国元勋的功臣战将一方面功勋卓著,另一方面文化修养有限,在建国初期缺乏起码的君臣观念,不懂基本的君臣礼仪,“和高祖刘邦共打天下的草莽英雄们争功、争官,在朝堂上饮酒狂欢,拔剑击柱,完全没有君臣之礼”^[9],表明高祖时期功臣战将漠视皇权。这种情况在叔孙通制定朝仪、高祖剪除异姓王之后有所改善,但在黄老思想“清静无为”的治国理念下,皇帝无为而治,国家事务实际上是掌握在以丞相为首的丞相府中。丞相是中央政府的最高长官,掌管着整个国家的政务,上自天时,下至人事,统归其管辖处理。汉初皇权有限与相权膨胀的关系直到汉武帝设立中朝以倾夺相权之后,才得以改观,皇权得到加强,相权则被逐渐削弱^{[10](P154-159)}。开国皇帝汉高祖在位时期尚且如此,更遑论本是代王的汉文帝。汉文帝是刘邦与薄姬所生,在刘邦众子中排行第四,本与皇位无缘,之所以能够登上皇位,是当时西汉统治阶层三种力量角逐平衡的结果。

皇族集团、军功受益阶层和外戚势力三方控制了西汉帝国初期的统治权。刘姓皇族集团因与最高统治者的血缘关系而获得权力,外戚势力则通过与皇族集团发生婚姻关系而掌权。军功受益阶层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是西汉初年“以刘邦集团的军吏卒为主体,一个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基础,具有高等社会身份的”群体^{[7](P72)},他们基于军功而取得军功爵及其他一系列政治经济利益。这三种势力相互之间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其自身的特殊利益,因此,三者之间既相互利用又相互牵制。

公元前180年,在刘邦死后实际掌握西汉帝国最高统治权的高后吕雉病死,作为外戚势力代表的吕产、吕禄等人为维护吕氏家族的既得利益,拥兵长安,企图发动兵变以夺取政权,改换江山姓氏。出身西汉皇族集团的齐王刘襄兴兵发难,朱虚侯刘章起而响应,与此同时,出身于军功受益阶层的太尉周勃乘机夺取北军控制权。双方里应外合,尽数诛灭了曾经势焰熏天的吕氏家族,傀儡皇帝

少帝刘弘,被认为本非孝惠帝刘盈所出,被废。国不可一日无君,而新立之君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延续西汉帝国皇统、维护皇族集团及军功受益阶层利益,且没有上演外戚专权的可能。经过吕太后的屠杀,刘邦众子中仅有代王与淮南王在世,然淮南王为代王弟,更主要的是其“母家恶”,相较而言,代王不但年龄最长,且“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11](P412)}于是,在皇族集团和开国功臣等军功受益阶层共同的策划下,最终拥立符合各方面利益要求的代王刘恒为帝。

一

在经历了吕氏家族被诛灭的血雨腥风之后,代王刘恒及其臣子对威信空前高涨的开国功臣等军功受益阶层心存忌惮。这从汉文帝入主长安之前,中央朝臣派人迎立代王,而代国主臣犹豫不决的心态可以推知。以郎中令张武为首的代国臣子对周勃等人迎立代王的真实意图深为怀疑,认为“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将,习兵事,多谋诈,其属意非至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喋血京师,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建议刘恒“愿称疾无往,以观其变。”^{[7](P105-106)}在中尉宋昌的劝说下,派亲信进京打探妥当确定无疑后,代王刘恒才入京继位。以藩王身份继位大统而政治威信尚未树立的汉文帝,在即位之后,立即对汉帝国的实际掌权者周勃、陈平等人大加封赐,拥立之功属第一的太尉周勃被尊为右丞相,而原右丞相陈平徙为左丞相,大将军灌婴升为太尉,此外加封周勃邑万户,赐金五千斤;陈平、灌婴邑各三千户,金各二千斤,充分肯定他们诛杀诸吕、安定刘氏的功劳。汉文帝通过加官进爵、赐金赏地来表明对他们既得利益与权益的维护,以此来获取元老重臣的拥戴。

即位次年正月,有朝臣建言册立太子,汉文帝再三推却,并声称:

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明于国家之大体。吴王于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岂为不豫哉!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贤及有德义者,若举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终,是社稷之灵,天下之福也。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取也。^{[11](P420)}

汉文帝此语,自然不是内心所想。他岂会不想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他之所以说应选择宗室昆弟中贤德兼备之人为储君,固然是因为故意退让以成就谦让之美名的人主惯取之姿态,更是出于对朝中开国功臣等掌权派的顾忌,是对自己所拥有的权力不自信的表现,有不得不如此虚言矫饰的苦衷。绛侯倚仗拥立之功常有骄主之色,而汉文帝则一再谦让,史载:“绛侯为臣相,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目送之。”郎中袁盎看不下去,认为“臣主失礼,窃为陛下所弗取也。”^{[7](P2267-2268)}“上从代来,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填抚,诸侯、四夷皆洽驩”^{[11](P421)}。这固然是说汉文帝以仁德治天下,但和四夷,抚诸侯,恰恰是汉文帝初期姑息放任的内外政策的真实写照。

汉文帝并不是不想改变这种臣强主弱的局面,在他即位半年后,周勃称病辞去右丞相之职,当是为汉文帝隐忍中的锋芒所迫。尽管他遵循无为而治的父训,但他却特别欣赏锋芒毕露能言善辩的贾谊,这与高祖、吕后选拔那些稳重木讷、不善言辞之人的用人标准迥异。史称每诏令议下,博士官、诸老先生遵循汉初黄老无为之训,未发一言,不置可否。这些老先生之所以唯唯不对,是因为朝廷之事按例是由丞相主持,从以下这个故事可见一斑:

孝文皇帝既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曰:“不知。”问:“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对。于是上亦问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谓谁?”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11](P2062)}

孝文帝询问左右丞相天下决狱、钱谷等事,周勃无以回答,而陈平直言不知并不以为非,由此可知在此之前皇帝从未问过这类事务,这些事情及其他国家事务分门别类由太常、郎中令、卫尉、廷尉、太仆、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等九卿分掌,而臣相之职,乃主掌人事,即陈平所言“主臣”,监督百官各掌其职。而天子所掌之务,乃是玄乎其玄的“理阴阳、顺四时”,无为而治即可。因此,汉文帝

令博士诸生议论朝政,在当时实为不合常理之举,皇帝打破了老规矩,才导致诸生未有所对。可年轻的贾谊毕露锋芒不循旧规,不但有问必答,还积极地针砭时弊建言献策,在《礼》一文中,他指出:“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主主臣臣,礼之正也;威德在君,礼之分也;尊卑、大小、强弱有位,礼之数也。”^{[12](P169)}他在《服疑》中还礼设计了包括区别名号、秩禄、旗章、冠履、衣带、环佩、宫室、车马、器皿等在内的一系列具体制度^{[12](P39-42)}。贾谊重塑礼制的目的在于区别君臣上下尊卑,以达到“主主臣臣”之别,加强皇帝的权威与至高无上。这正是备受元老重臣掣肘的汉文帝所期盼的,因此,贾谊深得汉文帝欣赏,在仕途上得到飞快的升迁,不过岁余,便从六百石的博士,迁到了千石的太中大夫,可谓是青云直上。之后,汉文帝还想任命他公卿,成为帝国的中央政府要员。

然而,汉文帝的这一提议,却遭到了丞相周勃、太尉灌婴等人的一致反对。究其原因,周勃稳重敦厚,不好文学善辩之人为末,贾谊年少轻狂肆意针砭时事为次,最根本的还在于贾谊提出了“列侯就国”的建言。对于汉文帝来说,这不失为巩固皇权的好方法,所以他很快予以采用:“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遗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驯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11](P423)}汉文帝以邑远吏卒给输费苦及不居封国无法教驯其民为由,诏令列侯离开长安,前往封国。这直接损害当权者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人的利益。离开长安,即离开了帝国的权力核心,回到封国只是小小一介封君,无法掌控西汉帝国的政治权利,自然也难以保护既得利益。周勃、灌婴等人岂肯轻易交出大权,一方面以国事系身若一旦离职恐有乱起来敷衍汉文帝的命令,并最终成功获得特许留在长安,另一方面则对此事的始作俑者贾谊展开了报复,诋毁贾谊“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尽管汉文帝有必要削弱周勃等重臣的势力,但更重要的是先稳定自己的皇位。“列侯就国”引起了以周勃为首的重臣元老一致的强烈反对,这对汉文帝的皇位来说是一个危险。周勃等人既能依靠军队、威望诛杀诸吕废除少帝迎立自己,自然

也能废除自己再去拥立他人。因此,贾谊这种激进的措施表面上看来是为了维护皇权加强汉文帝统治,但实际上却因时机未到不但不能起到积极作用,还可能给汉文帝及其统治带来严重后果。而且,在这之后的十一月、十二月连续两次发生了日食^{[11](P423)}。日食被视为皇帝德行有亏的反映,是上天对皇帝的警告,皇帝若不改正过失将有大祸发生。反对就国的列侯利用这两次天文现象大做文章,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汉文帝只好丢卒保车,疏远贾谊,并将他贬至长沙。

在汉文帝、贾谊与以周勃为首的元老重臣的较量中,以汉文帝的暂时让步、贾谊的被贬而告一段落。由此我们发现,汉文帝并不是不用贾谊,他确实执行了由贾谊所提出的政治策略,由于遭到了元老重臣的坚决反抗,才不得不做出让步。贾谊尽管被弃置荒处,但汉文帝想要抑制元老重臣势力的决心并没有消减。次年十一月,汉文帝旧事重提,直点绛侯之名,要求其辞去丞相之位,率列侯就国,“前日遣列侯之国,或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11](P424-425)}对比去年所下诏令,此令中汉文帝态度强硬,毫无商量余地。周勃见状只好交出相权,去往封国。同时,汉文帝还借升迁灌婴为丞相的机会废除了掌管帝国最高军事权力的太尉一职,减少位高权重的职位,以减少加强皇权的障碍。

三

在与重臣角逐中获得初步胜利的汉文帝在两年后把贾谊召回长安,问以鬼神之事,后世多对此持批评态度,如唐人李商隐作诗“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为贾谊不得重用而叹息。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汉文帝依然是皇权有限,他把贾谊从蛮荒之地召回来,本身就是对贾谊的器重,然而考虑到贾谊上次建言在朝廷中所激起的风浪,稳妥起见,问以鬼神之事,实乃韬光养晦之举。之后,汉文帝任命他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为汉文帝少子,极受宠爱,以此而命贾谊,是迁升其位。汉文帝虽不能将他留在长安,但多次派遣使者以国事之得失相问,颇有先好好磨砺他,然后再作打算之意。

为纠正社会上重商轻农社会现状,贾谊提出重本、广积粮食的意见;为化解汉匈矛盾,他建议

汉文帝“建三表”、“设五弭”、“与单于争其民”。汉文帝择其善者而用,先下《劝农诏》,又积极防御匈奴。班固评价汉文帝之待贾谊:“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7](P2265)}可谓中肯。

当此之时,诸侯王僭越礼制,封地广大,颇行不臣之礼,甚至发生了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发兵造反之事。面对诸侯国日益强大导致尾大不掉的现实,贾谊上《治安策》,建言“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通过分裂诸侯国的办法来削弱其力量,“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具体而言,则应“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它国皆然。”只要“地制一定,宗室子孙莫虑不王,下无倍畔之心,上无诛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7](P2237-2238)}在淮南王病死之后,汉文帝以其地封其子三人,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正与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相合。

但是,为何汉文帝后来未将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作为一项政策推行开来?纵观贾谊死后西汉帝国所发生的历史史实,贾谊所言“大抵强者先反”,“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7](P2238-2239)}不幸一一中的,而汉景、武帝所采取的削藩、推恩措施,正是贾谊向孝文帝力荐之策。问题在于,孝文帝何以未能采取贾谊的削藩措施?以汉文帝之贤,当不会不明白诸侯王国势力坐大、骄纵不法对中央政府和皇权造成的巨大压力,也应当能够辨白贾谊之《治安策》实不失为一剂良药。要理解汉文帝对贾谊削藩建议的不取,需要我们先明了汉初分封诸侯的理论依据。

汉初君臣认为秦帝国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便是未建诸侯国,为了“惩戒亡秦孤立之败”,避免重蹈秦亡之覆辙,以巩固西汉王朝在各地的统治,建立西汉帝国后,刘邦便“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7](P393)}尽管刘邦、吕后曾诛杀功臣,废除异姓诸侯王,但其目的不是为了废除诸侯国,而是为了铲除异姓王对刘姓天下的潜在威胁,刘邦之后大肆分封子弟为诸侯王,是将同姓诸侯国的存在作为拱卫刘姓江山的重要保障。可见建立诸侯国是西汉初年的

基本国策。汉文帝也是谨奉其策的,这从他入长安即皇帝位后,封儿子刘武、刘参为代王、太原王可知。代国乃汉帝国的北边屏障,当初刘邦将他封于此地,目的就在于借皇室血脉而掌控战略要地,以拱卫西汉中央政府。他深知代地的重要,因此分封自己的亲生儿子去守护边防疆土。其余各地的战略要地,也同样倚仗刘姓子弟的守卫。否则,天下一乱,西汉帝国也将如秦帝国一样,消解于顷刻之间。

这就可以理解,为何贾谊进言建立君臣尊卑等级秩序抑制周勃等元老重臣的势力以加强皇权时,汉文帝与他站在统一战线,尽管不得不将他外放,但依然坚决将既定政策推行下去,而对他的削藩措施却有所保留。汉文帝时,尽管有淮南王、济北王造反,但并未对皇权、西汉中央政权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兵一动即被平定,完全处于汉文帝的掌控之中。在反状未现的情况下,贾谊提出对被汉文帝君臣视为帝国屏障的众诸侯国施行削藩政策,是否能够成功削藩无法预料,但诸侯不满导致天

下动荡却是可以预见的结果。尽管贾谊多次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但汉文帝终不采用。贾谊后来因为梁王坠马而死,他见削藩之策又不为所用,终日愤懑哭泣,三十三岁而死。

贾谊的削藩之策,后来因为在汉景帝时发生了七国之乱,因此被后世视为先见之明,又因为汉景帝、武帝父子正是采用了削藩、推恩令等方式解决了尾大不掉的诸侯国问题,且为加强皇权而独尊儒术,因此贾谊被刘歆誉为“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然而,贾谊积极有为的政治策略,并不全部适合汉文帝在位时期的为政要求。贾谊第一次被逐出长安,远贬长沙之时,并不是汉文帝不想用他,只是迫于巨大的政治压力而不能用他。他第二次被任命为汉文帝爱子梁怀王太傅,汉文帝多次征求他对国事的意见,尽管未取其削藩之策,但毕竟对他其余的建议有选择性地予以采用。然而贾谊英年早逝,终使汉文帝有未重用贾谊之名。

参 考 文 献

- [1] 王兴国.贾谊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 [2] 唐雄山.贾谊礼治思想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
- [3] 赵敏,吕巧英.略论贾谊的有为治国之策[J].船山学刊,2009,(4).
- [4] 周晓露.贾谊被贬原因新探[J].湖南大学学报,2008,(2).
- [5] 陈建.贾谊人生悲剧成因之探究[J].太原大学学报,2008,(1).
- [6]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00.
- [7]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8]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9] 胥仕元,王险峰.汉初礼治与皇权巩固[J].河北大学学报,2008,(6).
- [10] 孟祥才.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11]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12] 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On Refusal of Jia Yi by Emperor Wen of Western Han Dynasty

PENG Li-hua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Jia Yi, an outstanding statesman of the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 proposed a series of useful and far-reaching political policies, but Emperor Wen did not put him in a crucial position of the core official-group in his empire. Emperor Wen's refusal could be explained as follow. First, Jia's proposals have damaged the interests of the core official-group and could not meet the demand of tributary system between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vassals. Secondly, Emperor Wen, a king with the limited power, who became the emperor with the help of government core official-group, could not implement the Jia Yi's policies. Under the strong political pressure, Emperor Wen had to appoint Jia Yi Grand Preceptor of King Changsha. Three years later Jia Yi was promoted as Grand Preceptor of King Lianghuai.

Key words: Jia Yi; Emperor Wen of Western Han Dynasty; limited imperial power; power reduction of vassal

(责任编辑:庄暨军)